

“怀念主义”叙事与文化帝国之梦

——以葡萄牙殖民史叙事的一个片段为例

冯倾城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 澳门 999078)

摘要: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荣光消散无存,葡萄牙从鼎盛恢宏的殖民主义帝国重新沦为偏安海角的弹丸之地。这种迅猛而巨大的心理落差像一记重拳闷闷地砸在每一个葡萄牙人的心头,“怀念主义”渐渐成为伊比利亚民族的集体意识。本文从社会沿革、心理变化、叙事话语及相关论著等方面对葡萄牙“怀念主义”进行解析,探讨其中蕴含的伊比利亚民族的文明观、价值认同、叙事话语。

关键词:叙事话语;怀念主义;葡萄牙文艺复兴;文化第五帝国

中图分类号:I0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1-0057-08

0 引言

葡萄牙曾是一个殖民地遍及亚非拉的世界性帝国,葡萄牙国王也曾是“唯一手中确实掌握着整个地球的皇帝”(萨拉马戈,1996:231),然而,随着英、法、荷兰等殖民帝国的先后兴起,葡萄牙乃至西班牙的全球霸权地位逐渐被削弱,进入20世纪以后,葡萄牙作为欧洲弱国更是被挤压到了国际政治版图的边缘,这就难怪会有葡国人愤愤不平地抱怨葡萄牙语是被排除在世界重大经济与政治决策之外的语言了。与葡语受冷落的境遇相应,葡萄牙文学作为欧洲文学的重要分支,也迟迟没有得到基本以西方文学观与价值观为尺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承认。因此,当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后,葡国人在欢欣鼓舞之余,也没忘了奚落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几句。但无论如何,萨氏的获奖终究是对因昔日荣耀不再而备感失落的葡国人的一种慰藉。对此,德国一家报纸的相关评论倒显得颇有见地:

如瓦斯科·达·伽马和其他航海家这样的曾帮助创建一个世界帝国的葡萄牙英雄们,他们的荣光已经被夺得荡然无存了。开始了一个人们自我发现的年代,对这个时代,若泽·萨拉马戈以自己的文学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同时,诺贝尔奖又是对多次受到忽视的葡萄牙文学的丰富性的一次表扬。(Christian, 1998:47)

1910年10月5日,葡萄牙共和国成立。同年12月,《鹰》杂志(*Revista A Águia*)在北部城市波尔图(Porto)创刊,特谢拉·德·帕斯科埃斯(Teixeira de Pascoaes)出任主编。1912年1月,波尔图发起一场名为“葡萄牙文艺复兴”(Renascença de Portugal)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特征之一就是鼓

收稿日期:2022-06-25

作者简介:冯倾城,女,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南国人文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扬州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葡比较文学、粤港澳文学、汉语诗学研究。

引用格式:冯倾城.“怀念主义”叙事与文化帝国之梦——以葡萄牙殖民史叙事的一个片段为例[J].外国语文,2023(1):57-64.

吹“怀念主义”(Saudosismo)。怀念主义源于知识分子所推动的文学、宗教和哲学运动。当时,知识分子还建立了“葡萄牙文艺复兴”团体,推出了一项促进民族文化的大计划,包括改造和设立平民大学、举办多种课程和学术研讨会、建图书馆等措施。而机关刊物《鹰》杂志承载了工作职能和社会理念,将此社会文化活化计划的相关人士汇集起来,如特谢拉德·帕斯科埃斯、马里奥·贝朗(Mário Beirão)、莱昂那多·科英布拉(Leonardo Coimbra)、斋梅·科尔特桑(Jaime Cortesão)、阿方索·杜阿尔特(Afonso Duarte)、安东尼奥·卡尔内罗(António Carneiro)、桑塔娜·狄奥尼修(Sant' Anna Dionísio)、埃尔纳尼·斯达德(Hernâni Cidade)、阿道夫·卡萨斯·蒙蒂罗(Adolfo Casais Monteiro)、奥古斯托·卡西米罗(Augusto Casimiro)、奥古斯托·吉尔(Augusto Gil)、阿方索·洛佩斯·维埃拉(Afonso Lopes Vieira)、劳尔·普罗恩萨(Raul Proença)、安东尼奥·萨尔吉奥(António Sérgio)、安东尼奥·科雷亚·德·奥利维拉(António Correia de Oliveira)、曼努埃尔·拉兰热拉(Manuel Laranjeira)、桑帕约·布鲁诺(Sampaio Bruno)等。

1914年2月,特谢拉·德·帕斯科埃斯撰写的宣言在《葡萄牙人的生活》(*A Vida Portuguesa*)上发表,正式吹响了“葡萄牙文艺复兴”的号角。其宗旨是“打击与我们的民族特性对立的影响、我们精神自主权的敌人,并使用人类智慧的各种方式,来推动这些本质上属于葡萄牙民族的新的道德力量来引导和教育人民”(Guimarães, 1998:61-63)。作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民族复兴的预言者,帕斯科埃斯拟在“怀念”中找到作为葡萄牙人特殊性的定义性特征。他创作了戏剧史诗《马拉努斯》(Marânus),被视为怀念主义的典范之作:

通过最亲密和微妙的情感表达来发现葡萄牙灵魂的人会看到其中存在着一种新宗教的内涵,尽管其隐于弥漫和混乱的形式当中。之所以使用“宗教”一词,是为了阐释灵魂对于道德至善、永恒之美和生命奥秘的诗意焦虑……葡萄牙灵魂正以一种独有而原创的方式感受这种焦虑:显而易见,当分析流行歌曲、传说、民间的语言、诗人和艺术家们的作品时,我们尤为需要注意这种来自民族最高的创作情感——怀念!(Guimarães, 1998:62-63)

为了便于理解“怀念主义”的旨趣,不妨先来看看一位葡国学者在探讨本民族性格时的一番论述:“我认为,我们可以揭示出葡萄牙人表现自身的两种方式。他们要么狂热地在痛苦中和在消极颓唐中寻求快乐,要么总是自我陶醉于别人对自己美德的讴歌。这二者之间难道有什么联系吗?要知道它们的背景都是一个,即对其祖国的文化充满了深厚的爱。”(马丁斯, 1995:205)

可以说,“狂热地在痛苦中和在消极颓唐中寻求快乐”与“自我陶醉于别人对自己美德的讴歌”即是“怀念主义”的两种体现方式,而“怀念主义”的基本内涵,则是对“祖国文化”的深情厚爱。因此,以“怀念主义”为其理论表达的葡国人的怀旧心态,主要是一种文化怀旧,但也不能排除某些葡国人的怀旧心态中包含对曾经盛极一时的葡萄牙殖民统治的缅怀与神往之情。葡萄牙大诗人佩索阿以短诗《永恒的怀念,你是如斯短暂!》(*Saudade eterna, que pouco duras!*)诠释了这种微妙的情怀。

1 关于葡国殖民史的两叙事

为了说明葡萄牙人矛盾交织的怀旧情绪,不妨对关于葡国殖民史的两叙事进行比较:

叙事一

1500年3月9日—1501年6月23日,葡萄牙人又派遣大船13只,由佩德罗·卡布拉尔(Pedro Cabral)率领去建立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关系。他在航行中发现了南美洲的巴西,即宣告巴西为葡萄牙占有;随后到达印度,又采办香料、宝石等东方产品返回里斯本,从此时起,葡萄牙舰队按期来往于东西方航路上。1510年窃占了印度果阿,1511年用欺诈和暴力灭了马六甲国家。1509—1515年,葡萄牙国王任命曾攻占波斯湾霍尔木兹湾的阿方索·德·阿尔布凯克尔(Afonso de Albuquerque)为总督,由他以果阿为首府对东南亚地区实行殖民主义侵略。

葡萄牙人在马六甲遇到了中国商船,羡慕中国的富庶,要求通商。于是,1517年(明武宗正德十二年)由费尔法·德安德拉德率舰八艘,经广东屯门,驶入广州。1553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葡商借口晾晒贡物,重贿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占据澳门,每年纳租银500两。此后,欧洲商人与传教士便从里斯本搭船来到中国。这期间,与葡萄牙人在东方的殖民活动相对照,西班牙人也在大西洋彼岸开始了殖民事业。(王绳祖,1995:14-15)

叙事二

葡萄牙人很快发现,要想占有香料的产地和垄断贸易,就必须摧毁穆斯林的商人和商行网络。受国王唐·马努埃尔(D. Manuel)的委派,唐·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D. Francisco de Almeida)作为总督,带着一套制订完备的政治行动纲领,1505年抵达印度。他在战略重地筑碉堡修要塞,下令一支舰队继续停泊在印度洋,还试图使葡萄牙垄断遥远的贸易。1509年,阿丰索·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接替唐·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他对印度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善于大胆使用手中的兵力,有高超的战略才智,不仅仅是亚洲葡萄牙“帝国”的缔造者,而且是该帝国在亚洲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好保证。1511年,阿丰索·阿尔布克尔克攻占马六甲,使葡萄牙人停驻东印度洋达六年之久,控制住它同太平洋的整个海上贸易。他把葡萄牙的管辖权和宗主权强加于霍尔本兹,1507到1515年控制了波斯湾,1510年,他占领果阿,建立了一块基地作为葡萄牙行政管理的大本营……

1518年,葡萄牙人占领锡兰的科伦坡,修建了无数的堡垒要塞,把该岛变成一块支撑葡萄牙制度的基石。在中国,1557年,葡萄牙人以永久性租赁的形式获得澳门。(马尔格斯,1998:62-63)

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奈特(1990:199)认为:“在非杜撰叙事(如历史叙事)中,真正的顺序显然是故事(过去了的事件)——叙述(史学家的叙述行为)——叙事:这个行为的产物,它有可能或有潜在可能以书面文字、录音、人的记忆等形式保存下来。事实上只因为有这样的暂留才可以认为叙事在叙述之后。”他随后区分“叙事”与“叙述”说,“叙事”指讲出来的话语,“叙述”指叙事时的情境(热奈特,1990:199)。换言之,即便是非杜撰的历史叙事,也会受到叙事情境的左右,从而与历史事件本身发生偏离,或者在客观的历史事件上打上主观性的烙印。

前文所引的两段文字,虽然所描述的都是所谓亚洲葡萄牙帝国建立的过程,但口吻、措辞就迥然不同。例如,对葡萄牙人侵占印度果阿与马六甲这两个历史事件,出自中国学者手笔的叙事一是以“窃占了印度果阿”和“用欺诈和暴力灭了马六甲”来描述,措辞相当严厉,而出自葡国学者手笔的叙事二则是以“占领果阿”和“攻占马六甲”来描述,措辞比较中性;又如,对葡萄牙人侵占澳门一事,

叙事一描述为“葡商借口晾晒贡物,重贿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占据澳门”,并将其视为“葡萄牙人在东方的殖民活动”的一部分,表达严厉的批评;叙事二则以“葡萄牙人以永久性租赁的形式获得澳门”这一简单描述轻轻带过(除萨斯,2000)。更大的谬论是“驱盗得澳说”。葡萄牙在17世纪中叶以前,一直公开承认它之所以能够在澳门居留,是贿赂中国官员的结果。但是葡萄牙居留者在澳门的势力增强以后,便逐渐改变措辞,声称它是给中国政府帮了大忙而获得澳门作为报偿的。1641年葡萄牙耶稣会士鲁德昭(Alvares de Semedo)出版《中国及其邻近地方传教志》一书,正式提出了“驱逐海盗得澳说”(黄鸿钊,1991:68)。再如,1509年葡国殖民统治者阿尔布凯克尔(又译阿尔布克尔克)接任殖民地总督后,力求进一步扩大葡萄牙的殖民势力,于1510年出兵占领印度西海岸重镇果阿,并将总督府移至该地(黄鸿钊,1991:37)。对此,叙事一将其定位为葡国在东南亚地区“殖民主义侵略”的头目,叙事二则将“善于大胆使用手中的兵力”“有高超的战略才智”等高帽子戴到他头上,并不无得意且不无景仰地把他定位为“亚洲葡萄牙‘帝国’的缔造者”,并且是“该帝国在亚洲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好保证”。

由上可见,某些葡国人对其殖民史确无反省之意,且不无自得之情,因而在言辞间,往往流露出对葡萄牙帝国曾有的显赫声势的无限神往。不过,这些葡国人对其殖民史的不知反省,未必是因为认同于“殖民主义”。从叙事二可见,他们其实也是讳言“殖民”或“殖民主义”等字眼的,不像以鲜明反殖立场出现的叙事一,频频运用此类字眼。这种情况与全球反殖及解殖的发展趋势不无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获得胜利的大国把各国人民要求自决权的声明写入联合国宪章,欧洲的殖民主义者相继承认前殖民地的政治独立。但由于“葡萄牙政府看清了大国关心小国独立的阴谋,他们企图重新划分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势力范围和原料产地,以求从中捞到好处。葡萄牙政府拒绝加入非殖民化运动的行列,并且提出葡萄牙是一个多大陆和多种族的国家,这是数百年历史所造成的。它的欧洲以外的领土并非真正的殖民地,而是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因此不容分裂”(萨拉依瓦,1994:359)。为了逃避国际舆论并抚慰被殖民者的反抗情绪,当时的葡萄牙政府“对宪法作了修改,删去‘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二词,改用‘海外省’和‘海外的’二词”(马尔格斯,1998:175)。

与此形成对照,相当多的葡国人固然对本国昔日的强大鼎盛心怀向往,又因为今日的衰退弱小而深感失落,因而滋生了“消极颓唐”与“自我陶醉”相混杂的怀旧情结,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本国殖民史予以反省。20世纪70年代以来葡国文坛出现的“殖民战争小说”,便是这类反思的重要体现。

2 反殖民主义与“文化第五帝国”之梦

1961年,葡萄牙第二共和国独裁政权为镇压葡前属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发动殖民战争,战争直至1974年独裁政权被推翻才告结束。13年的殖民战争,不仅给原葡属殖民地的非洲国家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导致葡萄牙方面近万人战死(Ferreira et al., 2016:169-170)。因为殖民战争迫使葡萄牙在非洲保持庞大的兵力和巨大的开支,而这些开支消耗了国家的大部分财政收入,反对在非洲开战的呼声成了反对政府的主要原因,而青年阶层,尤其是大学生更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反政府运动。海外政策曾经是有助于第一共和国诞生的民族理想,现在成了使第二共和国沉沦的政治问题(萨拉依瓦,1994:360)。早在独裁政权被推翻

之前的数年内,葡萄牙就已经出现了反殖民战争的文学作品,反映战争给葡萄牙人民带来的严重创伤。鉴于当局实行书刊检查,那时的作家们只能采取隐晦的手法曲折地映射这场战争。“四·二五”革命^①之后,非洲殖民战争瞬时变为葡萄牙人关注的热点,并成了作家笔下的一个重要题材,在葡萄牙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88年,葡萄牙“殖民战争小说”的代表作家若昂·德·梅洛(João de Melo)编选出版了两卷本的《战争的年代 1961—1975》(*Os Anos da Guerra 1961—1975*)一书并为之写了序言。该书选收了阿拉莫·奥利维拉(Álamo Oliveira)的长篇小说《时至今日》(1987)、费利佩·莱安德罗·马丁斯(Filipe Leandro Martins)的长篇小说《景色的支柱》(1981)、维尔吉利奥·阿尔贝托·维埃拉(Vergílio Alberto Vieira)的短篇小说集《战争的惩罚》(1979)、若泽·科雷亚·塔瓦雷斯(José Correia Tavares)的诗集《引向错误》(1984)、埃马努埃尔·费利什(Emanuel Félix Borges da Silva)的《词汇,鞭子》(1977)等诸多作品。一些殖民战争小说的作者不仅描写个人在非洲的冒险与经历,而且还着眼于探究葡萄牙人的命运,并对13年殖民战争给非洲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充满歉疚之情。

然而,虽然多数葡国人对殖民战争和殖民统治怀有反省意识,但他们仍然分享着“文化伊比利亚”(Ibéria Cultural)或“文化第五帝国”(Quinto Império Cultural)之梦,仍然希望本民族的语言在前殖民地国家或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延续其影响力乃至主导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化”与“本土化”本就存在张力,欧洲内部的冲突就有“伊比利亚意识”与“欧洲主义”的对立。在萨拉马戈的长篇小说《石筏》(*A Jangada de Pedra*)中,有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航海者形象。他孤身一人航行在茫茫大海之中,找寻自己的方向。从深层来看,这是对“欧洲主义”的抵制,除了一般的文化/政治动机外,也隐含着对意识形态单一化的反对:

随着地处伊比利亚半岛的西、葡两国加入“欧盟”,近代以来始终处于欧洲政治、文化边缘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主体性”问题,便变得更为突出。葡国作家萨拉马戈便出于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文化命运的深切关怀,而对葡萄牙人的“主体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既试图寻觅人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失去的主体性,又试图寻觅葡萄牙参加欧洲联盟后的主体性。(冯倾城,2007:169)

有学者提出“哲性乡愁”的概念:“原初的地域性的思乡之念就似乎变得越发脱离其本身,进而升华到文化精神的愁思,在这样的过程之中,生存的意义被放大。”(龚刚,2017:2)此种乡愁类比伊比利亚人的心态恰切不过,一腔深情浸润于今昔对照的淡淡的伤感,那是远去的旧时代的挽歌。对于伊比利亚人来说,曾经也和大英“日不落帝国”一般,拥有广阔的海外殖民地,传播自身的信仰、文化、法令等,可如今已然失去了那象征尊贵与荣耀的“地域原乡”,虽有自己的家园,可一方弹丸小国如何再能展现今日的辉煌?恢宏、伟大的家国感如何重觅,变成了一种乡愁式的焦虑。

在文化层次,伊比利亚人不断溯流而上,寻找本民族的文化源头,拟重新建构一个“文化原乡”,也就是上文所论述的“文化伊比利亚”,以文化怀旧寄托无处安放的“荣誉感”,此为第二种层次的

① 1910年10月初,葡萄牙国内爆发了一场军人和平民的革命,推翻了君主制的旧政权,是谓共和国革命,并于1910年10月5日宣告成立葡萄牙第一共和国。葡萄牙第二共和国始于1933年,又称新国家(Estado Novo)。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当时的政府,开创了第三共和国,是谓“四·二五革命”。

“文化乡愁”。

根据帕斯科埃斯的定义,“怀念是民族独有的精神之血,神圣的伤痕,永恒的轮廓”,通过揭示“代表感受与理念,情绪与反射所存在的一切的怀念的深层的、真正的、必要的意义,身体与灵魂,痛苦与快乐,爱与欲,大地与天空,达到了神圣的统一”。同时,“怀念体现着宗教的本质”,其导致了“葡萄牙民族当下的伟大”(Pascoaes, 1912:1)。那些揭示着“怀念”的诗人们在其诗中对此作了最大程度的展现。

作为新加勒特主义(neogarrettismo)和新浪漫主义(neorromantismo)遗留下来的民族主义继承者,并受共和革命而产生的公民行动需要的熏陶,怀念主义美学影响着诸如帕斯科埃斯、阿方索·洛佩斯·维埃拉、奥古斯托·卡西米罗·斋梅·科尔特桑、马里奥·贝朗、阿方索·杜阿尔特、阿尔弗雷多·布罗查多(Alfredo Brochado)等诗人。这种怀念主义审美的诗意轨迹表现为:“关于‘祖国-怀念’(Pátria-Saudade)或‘弥赛亚主显圣容节’等主题的寓言,加上妙不可言的关联和语言呈现,描画具有爱国性质的或与迫切得似是而非的葡萄牙人灵魂有关的象征。”(Pascoaes, 1912:9)例如,有这样一种融合了沉思与阅历的态势,其存在是为了彰显一种高瞻远瞩的先知氛围,为了记录一种传统的、神秘主义的、民族智慧和泛神论的仪式,以及最终为了赋“文字面貌”(fisionomia das palavras)一种基本价值(Pascoaes, 1912:15),即其作为图形形式本身的表达价值。

故在精神层次,“艺术家们在各自行走的艺术天空中寻找不可见的归宿,这不可见的归宿——人的性命安顿处,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龚刚,2017:6)。萨拉马戈写就长篇小说《石筏》,将寻觅性命安顿之处的哲性之思蕴含其中,在融于一体化潮流还是茕茕独立的困惑中,反复追问自身的主体价值,是为终极意义上的“哲性乡愁”。

3 结语

随着地处伊比利亚半岛的西、葡两国加入“欧盟”,近代以来始终处于欧洲政治、文化边缘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主体性问题便变得更为突出。葡国作家萨拉马戈出于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文化命运的深切关怀,对葡萄牙人的主体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伊比利亚人在“全球化”时代的漂流,并不是漫无目的的,他们内心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那便是萨拉马戈所梦想的“大西洋文化的一个盆地”,它是一个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为通用语言的文化共同体,在结构上类似于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所构想的“文化中国”。因此,萨拉马戈的“文化盆地”(Bacia Cultural)之梦,实质上也就是“文化伊比利亚”之梦。正如杜先生的“文化中国”之梦源于中国在近代以来在全球格局中所处的相对边缘的地位,萨拉马戈的“文化伊比利亚”之梦也与西、葡文化在全球格局中,尤其是在欧洲文化中的相对边缘地位密切相关。这也许正是孤立于欧洲主体之外的伊比利亚人在“全球化”的汪洋大海中寻找自身归宿和主体性的象征。

追溯葡萄牙历史,在17世纪中叶,维埃拉神父(Padre António Vieira)在其著述《将来的历史》中首先提出第五帝国的意念,这是精神上的帝国,希望整个世界因为宗教信仰而成为葡萄牙的子民。20世纪初,葡萄牙经济出现严重危机,国家委顿不振,与卡蒙斯并称为葡国最伟大的诗人佩索阿(Fernando Pessoa, 1967)在其诗集《音讯》中再次继承并发展了第五帝国的理念,寓意葡萄牙民族将

在精神和文化上统一整个世界。基于葡萄牙国民一直在缅怀其过去以西葡殖民扩张时代为里程碑的第四帝国的辉煌历史,且适值文化复兴运动的浪潮,佩索阿为第五帝国的理想重新定义,由葡萄牙国王统治全球的政治理念演化成为一种“文化葡萄牙”(Portugal Cutural)的精神性帝国的存在模式。这种佩索阿式的精神性帝国之梦,构成了葡萄牙人历史叙事的决定性情境。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萨拉马戈对西葡文化的特性及伊比利亚人的主体性格外注重,并强调面对以经济决定价值的文化现状,作为欧洲弱国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有必要逐渐培养出自己的特性和自己最深的根苗”,而不能被以“德国、法国和英国”为主体的所谓欧洲文化同化,但当他在面对伊比利亚的前殖民地尤其是葡国的前殖民地之时,却未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本土文化表现出足够的重视。换言之,他对欧洲文化领域内的支配形式保持着深刻的反思意识和高度的警惕性,但对伊比利亚文化加诸前殖民地本土文化的支配形式却缺乏反省意识。

就萨拉马戈的文化梦想而言,他构想的“文化盆地”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帝国,却非常接近于一个精神上的“文化帝国”的雏形。因为,这一结合了“伊比利亚-美洲”与“伊比利亚-美洲”两个虚拟地区的“文化盆地”,是以伊比利亚为主体,并联合了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而构成的。这些国家都是西、葡原来的殖民地,又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为母语。由于语言是文化与文学的载体,又是民族认同的基本依托,因此,一个以西语、葡语为通用语的文化共同体,显然一方面是以西葡文化或伊比利亚文化为其主体,另一方面又以西语、葡语为共同体内各成员确立其民族认同的基础。故而萨拉马戈以“文化依比利亚”为最终极目标的“文化盆地”之梦可说是佩索阿第五帝国神话的转化。

相对而言,葡语文化比西班牙文化的声音更为微弱。就葡萄牙语而言,虽然它是七个国家,即作为“欧洲最弱的国家之一”的葡萄牙本国和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巴西)以及五个非洲国家(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正式语言,在亚洲也有一点影响,并且是一亿六千万人的母语,亦即世界第六大语言,但它却同时也是一种“被排斥在世界重大经济与政治决策之外的语言”。由于葡萄牙的关系,它是欧盟的正式语文,也位列世界第六大语言,但不属联合国所承认的正式语文之列。语言是文化与文学的载体,又是民族认同的基本依托,葡萄牙的知识分子对葡语极其珍视,正如佩索阿所言:“葡萄牙语是我的祖国。”(Rebelo, 1986:9)萨拉马戈本人也认为,对葡语的感情是“爱国主义”的体现(Mendes, 1998:11)。

从葡国人的怀念主义-文化怀旧心态及葡国政府的海外文化政策便可以看到,多数葡国人虽然对殖民战争和殖民统治怀有反省意识,但他们仍然分享着萨拉马戈的文化梦想,仍然希望本民族的文化和语言在前殖民地国家或地区占据重要的乃至主导性的地位。因此,葡国人的怀念主义以及文化焦虑既颇具代表性地体现了弱势文化对“全球化”的抵触情绪及对自身主体性的寻求,又颇为特殊地体现了一个西方世界内部的前宗主国因滑入边缘地位而滋生的困惑与彷徨。

参考文献:

Ferreira, Diogo e Paulo Dias. 2016. *História de Portugal* [M]. Lisboa: Verso de Kapa.

Guimaraes, Fernando. 1988. *Poética do Saudosismo* [M]. Lisboa: Editora Presença.

Infopédia. Saudosismo. Porto: Porto Editora [EB/OL]. [2022-04-13]. <https://www.infopedia.pt/%saudosismo>.

- Marques, A. H. de Oliveira. 1977. *História de Portugal - Volume I* [M]. Lisboa: Editora Presença.
- Mendes, José Manuel. 1998. De livro em livro, José Saramago recebe o Prémio Nobel da Literatura [J]. *Camões Revista de Letras e Culturas Lusófonas*, (3):6-8.
- Pascoaes, Teixeira de. 1912. Renascença [N]. *A Águia* (1):1-3.
- Pessoa, Fernando. 1997. *Poesias Inéditas (1919-1930)* [M]. Lisboa: Ática.
- Pessoa, Fernando. 1967. *Mensagem* [M]. Lisboa: Ática.
- Rebello, Luís. 1986. Introdução. in *Antologia Poética de Fernando Pessoa*.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 Saramago José. 1997. *A Jangada de Pedra* [M]. Lisboa: Editorial Caminho.
- Thomas, Christian, 1998, Jangada das Ficções, José Saramago recebe o Prémio Nobel da Literatura [J]. *Revista de Letras e Culturas Lusófonas* (3):47-49.
- Vieira, António. s. d. *História do Futuro* [M]. Manaus: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a Amazônia.
- 德·奥里维拉·马尔格斯. 1998. 葡萄牙历史 [M]. 李均报, 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冯倾城. 2007. 文化主体性的诉求——论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 [J]. *政大中文学报* (8):151-174.
- 龚刚. 2017. 从感性的思乡到哲性的乡愁——论台湾离散诗人的三重乡愁 [J].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2-6.
- 黄鸿钊. 1991. 澳门史纲要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马丁斯, 吉列尔梅·德·奥利维拉. 1995. 葡萄牙的机构及事实 [M]. 黄徽现, 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 热奈特. 1990.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M]. 王文融,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萨拉依瓦. 1983. 葡萄牙文学史 [M]. 路修远,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 萨拉依瓦. 1994. 葡萄牙简史 [M]. 李均报、王全礼, 译.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 萨拉马戈. 1996. 修道院纪事 [M]. 范维信, 译.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 王绳祖. 1995. 国际关系史(第一卷)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 王岳川. 1999. 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 [M]. 山东: 教育出版社.
- 徐萨斯. 2000. 历史上的澳门 [M]. 黄鸿钊, 李保平, 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出版社.

The Narrative of “Portuguese Nostalgia” and the Dream of Cultural Empire: Taking a Fragment of Portuguese Colonial History as an Example

FENG Qingcheng

Abstract: With the loss of the glory of the Great Navigation era, Portugal has changed from a great colonial empire into a tiny place in the corner of Europe. This sudden and huge change hits like a heavy punch in every Portuguese heart, and “Saudosismo” gradually becomes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the Iberian nation.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Portuguese Saudosismo” from the aspects of social evolution, psychological change,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related works, and explore the cultural view, value identity and narrative discourse of the Iberian nation contained in it.

Key words: narrative discourse; Saudosismo; Renascença de Portugal; Quinto Império Cultural

责任编辑: 龙丹